

# 媒體素養與全民國防學校教育：跨國經驗的借鑑與反思

劉大華

國防大學政作戰學院新聞學係助理教授

## 摘要

在後真相（post-truth）的時代，隨著數位技術的快速發展，錯誤資訊透過網路和社群媒體的傳播，對全球民主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情緒性訊息常取代事實，成為塑造公眾輿論的主要力量，進一步削弱了對民主制度和公共機構的信任，影響國家安全。在此背景下，媒體識讀教育被視為應對假訊息和外國訊息操縱（FIMI）的有效因應策略。當前各國已制定或推動相關的媒體識讀政策，強調批判性思維與訊息評估能力的重要性。本文透過文獻整理如歐盟、美國、以色列等媒體識讀教育的作法，從跨國經驗中獲得借鑑與反思，並提出「免疫理論」在媒體識讀中的應用，透過讓公眾事先接觸並反駁虛假訊息，能夠增強他們對未來訊息操縱的抵抗力。總體而言，媒體識讀教育不僅能夠提升個人對假訊息的免疫力，還能有效阻止外部勢力對社會輿論的操控，從而維護民主制度的穩定性和社會韌性。

**關鍵字：**媒體素養、假訊息、後真相時代、免疫理論、外國訊息操縱

## 壹、前言

### 一、後真相時代的挑戰

過去十年間，數位環境的急劇變化，網路與媒體成為錯誤資訊傳播的重要渠道，在政治、氣候、健康等議題中不斷擴散，訊息的傳播速度和範圍前所未有，為全球民主國家帶來了挑戰。數位時代重新定義了資訊的傳播方式，資訊不僅以更快的速度產生，也讓注意力的競爭空前激烈。後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 2016 年的年度詞彙，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事實與證據的重要性被情感和個人信仰取代，這對國防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透過假訊息散播和操縱，境外敵對勢力可以擾亂國內輿論，削弱公眾對國家機構的信任，甚至影響軍事戰略和決策。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在此扮演關鍵角色，幫助民眾和國防部門辨識虛假訊息，防止認知戰的侵蝕，進而維護國家安全。因此，媒體識讀的普及能提高對資訊操控的防範，有效阻斷外部勢力的滲透（Hendrix-Soto & Nash, 2023）。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媒體扮演著傳遞訊息、形塑輿論的重要角色，但同時也面臨著假新聞、偏見、操控等資訊污染的威脅。隨著資訊傳播方式的快速變革，傳統的安全框架需要與新興的媒體環境接軌，如何在資訊洪流中明辨真偽，成為每個公民的必修課，而這正是媒體識讀的重要性所在。媒體識讀不僅是個人能力，更是國家安全的基石。當民眾缺乏媒體識讀，容易被虛假訊息所迷惑，進而影響其判斷力，甚至做出錯誤的決策。在網路時代，資訊傳播速度極快，假消息更能迅速蔓延，造成社會恐慌、政治動盪，進而危害國家安全。因此，提升國民媒體識讀成為當務之急。政府應積極推動媒體識讀教育，從學校教育開始，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資訊查證的能力。同時，政府應建立健全的媒體管理機制，杜絕假新聞的散播，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

### 二、全民國防學校教育

我國的全民國防教育法針對學校教育部分，制定了一系列具體計畫與措施，目的是提升國防知識並增強防衛意識。本法案於 2005 年公布，並經過一年的準備階段，包括「全民國防教育日」的網路票選活動，最終確定每年 9 月 3 日為「全民國防教育日」。相關措施包括完成學校教育規範、暑期戰鬥營及巡迴教育宣教等，旨在讓國防教育融入各級學校的教學計畫，

並透過實地參與活動，如暑期戰鬥營，讓學生接受軍事訓練，增強對國防事務的認知。此外，透過獎勵機制鼓勵在推動國防教育上表現傑出的個人和單位，同時透過媒體宣導擴大大眾對國防的關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22）。

依規定，學校需將國防教育納入課程計畫中，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常見的教學成式包括小組討論、案例分析和實地參訪等，增進學生對國防的理解。為了確保課程的品質，教師也需要接受專業培訓，掌握相關的教學方法，並透過教師間的交流與合作，提升國防教育的整體水平。有些學校還會定期舉辦與國防相關的主題活動，並促進學校與社區合作，邀請國防專家或退伍軍人進行講座，讓學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國防工作的實際運作，以實現提升全民國防素養、促進社會對國防事務的深入理解與關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24）。

根據國防部對全民國防教育執行成效的報告指出，以學齡青年學子為目標對象，已實施「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寒（暑）期戰鬥營」、「走入校園」、「學生實彈射擊體驗」及「南沙研習營」等系列活動，活動的多元性與參與人數的規模堪稱豐碩（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23）。然而從說服傳播的角度來看，當前的活動多屬「正向訴求」（Positive Appeal）。這類策略強調使用正面訊息，強調某個行動的正面結果或好處，包括透過激發正面積極的情感（如愛、幸福、希望）來影響受眾的態度或行為，或是利用邏輯、數據或事實來強調行動的益處等。這在說服傳播中常見於廣告、政治宣傳或公共關係活動中（Yousef et al., 2023）。面對後真相時代中各類虛假訊息對國家安全的愈挑戰，突顯免疫理論（Inoculation Theory）在形成全民國防學校教育策略的參考價值。免疫理論強調，當人們事先暴露於削弱版本的反對訊息，並接受反駁訓練後，會增強其對於說服攻擊的抵抗力。這與媒體識讀的關係密切，因為媒體識讀教育正是幫助個人識別和批判性分析媒體訊息，從而提升他們應對假訊息或偏見訊息的能力。當人們具備媒體識讀，便能依賴「預防性抗體」預先辨別訊息操控的手段而形成「認知免疫」，從而抵禦錯誤訊息的影響，幫助人們能在面對未來的說服攻擊時保持清晰判斷力（Oberiri Destiny Apuke & Tunca, 2023）。

## 貳、外國訊息操縱與干涉

現任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兼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Josep Borrell 提到，在俄烏戰爭和中東地區除了武裝衝突外，「外國訊息操縱與干涉」（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簡稱 FIMI）問題也顯得日益嚴重，這種行為由外部勢力刻意、系統性地操控訊息，意圖混淆真相，播散分裂、恐懼與仇恨。FIMI 與混合威脅和網絡攻擊密切相關，已成為現代戰爭的關鍵工具，俄羅斯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它利用 FIMI 為其侵略烏克蘭的行動辯護並影響國際輿論。時至今日，FIMI 的威脅不僅僅限於單一國家，它對所有依賴自由、公開訊息的民主國家構成嚴重挑戰。如果我們的社會無法確保訊息的透明性與真實性，民主制度將難以正常運作（EEAS, 2024）。

俄羅斯和中共已被證實 FIMI 活動的主要參與國，其策略用於轉移公眾注意力，將責任推卸給其他行為者或改變話題焦點以扭曲事實。歐盟的調查研究歸納了 FIMI 操縱者的「5D」策略，包括否認、扭曲、分散、威嚇和分裂五個面向：1.否認（Dismiss）：針對批評做出反擊，否認指控並貶低來源的可信度；2.扭曲（Distort）：改變事件的框架，扭曲事實並改變敘事；3.分散（Distract）：將注意力轉移至其他行為者或話題，或將責任推給他人；4.威嚇（Dismay）：以威脅或恐嚇手段使對手退縮；5.分裂（Divide）：製造衝突，擴大社群內部或群體之間的分歧（EEAS, 2023）。

這些策略旨在操縱訊息，並進一步削弱目標社會的穩定性。由於圖像和影音成本低、易於傳散，加上假冒技術愈發精密，已成為是 FIMI 活動中最常使用的形式。例如，俄羅斯的網軍頻繁冒充國際機構、大眾媒體和受信任的個人，甚至有整個雜誌風格被完全仿製的情況。被操弄的訊息令人難以分辨真偽，並在不同平台上迅速傳播，這些行為增加虛假訊息的可信度，進一步擴散影響。另值得注意的是，在內容設計方面，FIMI 擅長改變敘事框架和觀點，扭曲事件本質，例如早在 2013-2014 年的烏克蘭的「廣場革命」（Maidan Revolution）開始，俄羅斯透過宣傳和訊息操控，試圖削弱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利用敘事如「烏克蘭是納粹國家」和「烏克蘭是一個失敗國家」，來為其軍事行動鋪路。而在 2022 年全面入侵烏克蘭後，俄羅斯在對外宣傳上，透過 FIMI 活動試圖削弱國際對烏克蘭的支持，並試圖混淆侵略者

與受害者的角色，利用各種敏感議題如移民、能源價格和生活成本，進行訊息操控以加劇國際社會的矛盾，指責北約和美國試圖透過烏克蘭圍堵俄羅斯（EEAS, 2023）。

中共從吸引俄羅斯的經驗中，也逐步發展自己的特色，在策略上愈加多樣化，頻繁透過外交官、官員和國家控制的媒體，一方面是推動自己的敘事，另一方面是壓制反對聲音。例如透過收買，利誘名人、網紅等社群媒體的意見領袖，重新塑造有關新疆人權等議題的敘事。另一方面也透過國家影響力和經濟手段，壓制與中共官方敘事相悖的聲音或訊息，並且也限制了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採訪報導（EEAS, 2023）。

由於 FIMI 的活動正導致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加劇社會內部的分歧和對立，影響政府和國際組織政策的執行，歐盟官方建議成員國政府從教育、提高意識和擬定安全政策等三個領域著手，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應對威脅。其中，媒體識讀教育在對抗外國訊息操縱與干涉（FIMI）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透過培養批判性思維，媒體識讀幫助公眾深入分析和評估訊息來源的真實性，進而識別並抵抗虛假訊息的影響。FIMI 經常利用錯誤或誤導性內容來操控民眾情感、加劇社會分裂，從而削弱公眾對民主機構的信任。媒體識讀不僅涉及訊息的消費，還包括訊息的生成與傳播，使人們更負責任地參與社會討論，對抗極端化和虛假敘事。此外，許多國家已將媒體識讀納入其教育政策和課程中，以應對來自外部的訊息干擾，特別是歐洲一些國家將其視為國防的核心組成部分，提升社會的韌性。這樣的政策不僅強化了公民的防護意識，也讓整個社會能在面對 FIMI 的挑戰時更具備抵禦能力。總的來說，媒體識讀的推廣不僅有助於個人理解和消化訊息，還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穩定與民主制度的健全發展（Munteanu, 2024）。

## 參、假訊息的威脅：

### 一、假訊息的影響

根據歐盟的定義，假訊息是指「為了經濟利益或故意欺騙公眾而創造、呈現和傳播的可驗證的虛假或誤導性訊息」。這與「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不同，後者指的是無意間傳播的錯誤內容。假訊息則是帶有強烈意圖的故意謊言，通常以欺騙或引導受眾的特定觀點為目的。此外，文章還提到了另一個概念「惡意訊息」（malinformation），即雖然內容真實，但

其發佈不符合道德規範，因為它的傳播可能會對公眾或個人造成損害（Sádaba & Salaverría, 2023）。

假訊息的迅速傳播對現代民主社會構成了重大威脅，尤其是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訊息過量與混亂，隨著訊息渠道的多樣化，公眾每天接收的消息數量急劇增加，但其中許多消息並不真實。這些錯誤的內容有時是無意間散布，但更多時候是刻意設計來誤導公眾。其次是傳播速度與影響：由於數位科技和社群媒體的廣泛應用，假訊息可以在短時間內傳播到大量受眾，並且極易跨越地理和文化邊界。例如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尤為明顯，當時有大量錯誤的健康訊息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傳播。再者，是社會信任的下滑：假訊息的泛濫導致公眾對媒體、政治家及公共機構的信任逐步下降，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與分裂。隨著對訊息來源的信任度降低，公民變得更加難以判斷何種訊息是可靠的，這使得假訊息的影響更加深遠。最後，法律與技術手段的不足：儘管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經採取了一些法律和技術手段來打擊假訊息，但單憑這些措施無法完全阻止假訊息的傳播。假訊息的傳播過程複雜，並且往往依賴於受眾的自願參與，這使得治理更加困難（Boler & Davis, 2018）。

總結來說，假訊息的傳播不僅是媒體內容真偽良莠的問題，更是一個涉及社會信任、公共安全和民主穩定的綜合挑戰。對此，當前全球民主國家視媒體識讀成為解決假訊息問題的重要工具之一，透過提高公民識別訊息真假的能力，可以有效減少假訊息的負面影響。（Sádaba & Salaverría, 2023）。

為應對俄羅斯網軍的資訊戰，歐盟與北約在赫爾辛基成立「歐洲混合戰威脅對策中心」。該中心致力於分析俄羅斯在歐洲多個國家中利用社群媒體進行的干預行為，並揭露其在多場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角色。具體來看，俄羅斯網軍在多個大選中利用社群媒體散播假新聞，像是從 2016 年起，俄羅斯網軍不斷地透過散播與移民和難民相關的假新聞，激化德國社會的內部分歧，支持極右翼政黨。其中一個著名的案例 2016 年 1 月，德國發生了所謂的“我們的麗莎”（Our Lisa）事件。這起事件涉及一名俄裔德國少女“麗莎”聲稱被中東移民綁架並性侵，引發了輿論風暴和社會抗議。然而，德國警方調查發現，這個故事並不真實，少女編造了這個綁架事件。儘管如此，俄羅斯官方和媒體強烈譴責德國政府的處理方式，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緊張關係，該事件被視為假新聞操作的經典案例（Meister, 2016）。

隨後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俄羅斯駭客入侵希拉蕊競選團隊、民主黨眾議院競選委員會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系統，並竊取了大量資料。俄羅斯網軍針對種族、移民和槍枝管制等議題，有組織地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散播不利於希拉蕊的虛假訊息

(Abrams, 2019)。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前夕，候選人馬克宏的競選團隊遭受到「大規模且協調」的駭客攻擊，數萬封偽造的內部郵件和文件在投票日凌晨被公開，試圖削弱候選人馬克宏的支持，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網路專家和情報部門追溯源頭時，發現俄羅斯情報機構介入的跡證，但克里姆林宮否認參與此事 (Guardian, 2017)。同年，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期間，俄羅斯被指控利用社群媒體干預西班牙內部事務，推動分裂主義言論。俄羅斯支持的網絡平台和帳戶透過推廣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的虛假訊息，激化了西班牙的社會和政治矛盾 (Emmott, 2017)。

這些行動被認為是俄羅斯試圖透過資訊戰來削弱西方民主國家的內部穩定性，俄羅斯的資訊戰戰略展示了其透過社群媒體操縱輿論、影響國際政治進程的能力。其主要目標是削弱歐洲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加強極右翼政黨的影響力，並鞏固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為應對此類威脅，歐洲和北約國家需進一步加強資訊素養教育，提升輿論防禦能力，並持續監測社群媒體上的網絡活動。

## 二、俄羅斯網軍在社群媒體上的主要策略

俄羅斯網軍及其相關的惡意行為者在網絡空間中的運作已經展現出高度的策略性和靈活性，對全球政治和國家安全構成了顯著威脅。這些行動包括多個方面的技術和心理戰術，旨在透過假帳號、心理操控和跨平台的整合性攻擊，擾亂目標國的輿論環境並削弱其民主制度。其策略可概分為三個層面：

首先是「資訊武器化」(weaponized information) 指的是將資訊作為一種戰略工具來影響對手的認知與行為。俄羅斯的網軍不僅依靠網路攻擊，還透過操縱或扭曲資訊達到影響公眾輿論和政府決策的目的。這種手段包括散布假新聞、進行心理戰、擾亂政治進程，以及削弱敵對國家的內部穩定。資訊武器化的核心目標是削弱對手的信任，操控國際或國內輿論，並在不使用傳統軍事手段的情況下實現戰略優勢。這些經驗結合不斷創新的策略，使其反西方的資訊戰變得難以應對。由於非民主國家擁有系統性優勢，能夠更有效地發動資訊行動，削

弱敵對社會的韌性。資訊作戰已成為現代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中軍事與非軍事手段結合的關鍵組成部分。這一戰略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存在，難以改變（Olchowski, 2022）。

其次，俄羅斯網軍經常透過假帳號、網路機器人（bots）和「網路水軍」（trolls），這些帳號能夠迅速轉發和分享內容，製造虛假的社交互動，從而增強假新聞的可信度。此外，俄羅斯網軍根據特定受眾群體進行訊息定制，針對保守派、移民等群體推送特定的虛假訊息，目的是加深社會分歧，影響政治立場。俄羅斯網軍善於利用重大事件來操控輿論，在選舉、社會運動或政治辯論期間加強訊息戰，以影響公眾情緒和對民主機制的信任。這一策略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表現尤為明顯，俄羅斯網軍利用選舉關鍵時刻大量散佈有利於特定候選人的內容。他們不僅散播虛假訊息，還進行心理戰和認知操控，目的是讓受害國的民眾對自身社會和政府體制產生懷疑。這種手法不僅削弱了社會凝聚力，還削弱了公眾對媒體和政府的信任感，進而降低選民的投票意願和政治參與度（Akimenko & Giles, 2020）。

第三是多種技術、跨平台和多重目標打擊，俄羅斯網軍的目標並不局限於單一的社群媒體平台，而是在多個平台上同步進行訊息散播，並且除了政治人和主流媒體外，也針對非營利組織和獨立媒體發動網絡攻擊，以最大化其影響力。例如，針對東歐的非政府組織、俄羅斯反對派人物、智庫官員和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等目標。這些攻擊透過高度定制的社交工程技術來欺騙受害者，誘使他們點擊惡意鏈接，進而收集登錄憑證。在這些攻擊中，攻擊者使用了 Proton Mail 和 Proton Drive 等工具來偽裝成受害者熟悉的組織或個人，增強欺騙的可信度。同時，這些攻擊還展示了俄羅斯網軍如何巧妙利用社交工程來避免被自動防禦工具檢測到，透過不附加文件的方式引誘目標回應，以增加攻擊的成功率。俄羅斯網軍透過與心理戰手段，利用假帳號、針對性內容、重大事件、心理戰和跨平台操作來實施訊息戰，並透過網絡釣魚等技術攻擊國內外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對全球資訊環境和國家安全構成了深刻威脅。這些行為顯示出他們在全球資訊戰中的高度靈活性與有效性，並強調了傳統安全與網絡空間防禦相結合的重要性（The Hacker News, 2024）。



## 肆、世界各國致力培養全民媒體素養

### 一、歐盟

在媒體識讀的推動歷程中，歐盟 1999 年啟動「更安全的互聯網」(Safer Internet) 計劃，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安全的網絡環境。該計畫的背景源於網路普及後，青少年曝露的網路風險不斷增加，包括網絡霸凌、不當內容和數位隱私等問題。因此政府展開建立熱線、舉報機制、推動媒體識讀教育、促進家長與教師參與青少年的網絡安全監管等具體行動，並定期發起「網路安全日」(Safer Internet Day) 等全球性宣傳活動，推廣安全網絡使用觀念 (Daniëlle Flonk & Obendiek, 2024)。

而隨著俄羅斯的網路威脅不斷滲透，歐盟於 2018 年制定「因應假訊息行動計畫」(Action Plan against Disinformation)，並成立了「假新聞與網上假訊息高級專家組」(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Fake News and Online Disinformation)，目的是應對假訊息對民主、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威脅。該行動計畫提出四大支柱：1. 提升假訊息偵測能力：強化歐盟與會員國的數位資訊分析系統。2. 強化合作與協同反應：建立快速警報系統，促進跨國合作。3. 加強透明度與責任機制：要求社群媒體平台提高內容的透明度。4. 提升公眾意識與媒體識讀：推動公眾教育，培養批判性思維與媒體識讀，讓公民能更有效辨識假訊息。這些措施旨在保護歐盟的民主機制免受假訊息侵害，並強調公私協作的重要性 (Sádaba & Salaverría, 2023)。歐盟在 2020 年成立了歐洲數位媒體觀察站 (European Digital Media Observatory, EDMO)，以促進歐洲國家的訊息核查和媒體識讀發展。該機構的任務包括協調訊息核查機構、推動假訊息相關研究、建立公共入口網站以及幫助監管數位平台。同年，西班牙政府的設立了「常設反假訊息委員會」(Permanent Commission against Disinformation)，該委員會負責制定策略，特別是透過推廣媒體識讀來對抗假訊息。

Martínez-Bravo 等人 (2020) 進行的研究揭示，媒體識讀的相關教育內容在歐盟各國的義務教育課程中普遍存在，但具體實施和效果在各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歐盟的許多政策主張將數位技能和媒體識讀內容整合到學校的義務教育課程中。這些課程不僅涵蓋數位工具的操作知識，還強調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以幫助他們識別虛假訊息、謠言和不實報導。透過這樣的教育改革，學生可以學會更加批判性地看待他們在網絡、社群媒體及其他數

位平台上接收到的資訊。然而，儘管許多國家已經採取了這一措施，但其具體實施效果仍然存在差異。例如，在西班牙，雖然教育政策包含了媒體識讀相關的跨學科內容，但並沒有像歐盟建議的那樣設置專門的媒體識讀課程。相反，媒體識讀通常作為其他科目中的一部分被教授，這使得其具體的效果難以評估（Martínez et al., 2020）。

除了數位技能的傳授，也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媒體識讀不僅僅是學會如何操作數位工具或瀏覽網絡，它還涉及如何解讀和分析資訊。歐盟特別強調，應該注重發展學生的批判性能力，讓他們能夠區分事實與虛假訊息，尤其是在面對來自社群媒體、網絡平台或其他非傳統媒體的資訊時。在此過程中，學生應該被鼓勵質疑和驗證訊息來源，並理解媒體和資訊製作的背後過程，這將幫助他們更好地判斷訊息的可信度和準確性（Martínez et al., 2020）。

數位媒體的普及也使得這些計劃的推行變得更加可行，因為相較於過去的傳統媒體，數位媒體所需的基礎設施較少。此外，參與媒體製作的過程還可以幫助學生內化一些關鍵的媒體識讀技能，如選擇合適的訊息來源、對內容進行批判性評估等，這對於抵禦假訊息尤為重要（Sádaba & Salaverría, 2023）。

最後，教師在推動媒體識讀教育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然而，教師本身的媒體識讀水平和對數位技術的熟悉度仍然參差不齊，這成為推動該教育改革的一大挑戰。因此，歐盟和各國政府也在推動教師培訓計劃，幫助教師們掌握媒體識讀和數位教育的方法與技巧。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針對教師進行專門的媒體識讀培訓，確保教師能夠有效地教授這些內容，並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的討論和分析（Sádaba & Salaverría, 2023）。

儘管歐盟在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相關研究指出不足之處。包括各成員國在推動數位和媒體識讀課程時，缺乏統一的標準和具體措施，導致一些課程內容過於零散，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另外教師普遍需要更多關於媒體識讀的專業培訓。許多教育者本身對數位工具和媒體識讀的理解有限，這限制了課程的品質和深度。整體來說，歐盟目前整體的媒體識讀教育過於注重技術技能的培養，而忽視了對學生批判性思維的發展。許多課程過度關注如何使用技術工具，而非如何思考和分析訊息的來源及其可靠性（Sádaba & Salaverría, 2023）。

## 二、芬蘭

根據調查，芬蘭在新聞透明度、媒體信任和辨別假訊息的能力在歐盟成員國中常年排在首位，然而這樣的成績並非僥倖。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來看，芬蘭從 1917 年脫離俄羅斯獨立，但剪不斷地是接壤 832 英里的邊界。長久以來飽受來自俄羅斯的國際宣傳，大多數都是圍繞移民、歐盟或芬蘭是否應該成為北約的正式成員等議題。自從 2014 年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後，這些宣傳升級為資訊戰，愈來愈多系統性和針對性的虛假訊息傳播、仇恨言論和網路騷擾，引發社會分裂與兩極化的隱憂，促使芬蘭政府在推展國民整體的媒體識讀教育更是不移餘力，重點放在提升公民對於訊息來源的評估能力，以及理解外部勢力如何利用媒體操控輿論（Lau, 2023）。

在課堂上，芬蘭的教育將媒體識讀融入不同學科，例如數學課讓學生意識到數據如何可能被操控來誤導公眾。而歷史課會分析過去著名的政治宣傳的案例，理解其背後的意圖。藝術課則探討圖像如何被扭曲以傳達特定訊息。透過多樣的教設設計，養成學生批判性的思維（陳韻涵，2023）。芬蘭不僅將媒體識讀視為教育問題，也將其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應對系統性虛假訊息和反民主訊息的傳播時。芬蘭媒體養教育在於由教育和文化部主導，同時也強調多協調內政部、財政部等跨多個部門合作，共同推動媒體識讀教育的發展。依據芬蘭的「國家媒體教育政策」，為應對假訊息和網絡威脅，媒體識讀能夠幫助公民在數位文化中積極且負責任地行動，並保護自己免受虛假訊息的侵害（Benjamin, 2022）。

## 三、美國

美國的媒體識讀教育政策主要依賴州和地方層級的推動，雖缺乏全國統一的政策框架，但得益於非政府組織與學術機構的支持，提供課程設計、教師培訓和學生參與活動，媒體識讀教育呈現多元化的教學內容（Benjamin, 2022）。例如，美國的中學教師會讓學生閱讀文章後，設計一份清單請同學檢查文章的來源並判斷真偽。這項清單包括：「你知道這個來源嗎？或者它是由常見或知名來源創建的嗎？例如《國家地理》、探索頻道等」、「與你已知的相比如何？」、「資訊有道理嗎？你理解這些資訊嗎？」、「你能夠驗證這些資訊是否與其他三個或更多同樣可靠的來源一致嗎？」、「有領域內的專家參與或撰寫這些資訊嗎？」、「這些資訊有多新？」（Boyd, 2017）。

McComiskey (2000) 在《Teaching Composition as a Social Process》一書中，提出了解讀媒體文本的幾個關鍵策略，他強調寫作和解讀應視為一個社會過程。他主張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分析文本的權力結構，並鼓勵從社會文化背景的角度理解文本的意涵。此外，他提倡透過小組合作和跨文本比較，讓學生能更全面地理解媒體訊息。Joanne Addison (2018) 的分析框架進一步結合了 McComiskey 的修辭、文本和話語層面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透過批判性問題來解讀任何媒體文本。例如：「這個文本的風格和語氣如何將觀眾帶入特定的角色？」、「文本所屬的社群理想公民形象是什麼？」、「這樣的問題設計幫助學生養成批判性習慣」，教師可以讓學生討論「誰在製作這個故事？為什麼要這樣呈現？」或者「這個故事的受眾是誰？」以幫助學生理解媒體背後的動機和權力結構。透過反思從而更深入地分析新聞、廣告或其他媒體文本，發展學生的媒體識讀能力。

#### 四、以色列

以色列同樣面臨假恐息的威脅挑戰，包括哈瑪斯組織、伊朗等外國勢力的滲透，動員其支持者利用社群媒體平台（如 Telegram），利用該平台較為寬鬆的內容審查，創建大量假帳號和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來製作和傳播假消息散播大量假訊息，以影響公眾輿論，削弱以色列的國際形象和合法性。特別是在 2023 年 10 月以哈衝突以來，許多聲稱來自戰場的一手消息在網路社群迅速蔓延。其中一則受到大量關注的是一張用白布包裹嬰兒屍體的照片，聲稱是被以色列軍隊殺害的巴勒斯坦嬰兒，然而實際上是出自 2013 年敘利亞化學武器攻擊事件中的圖片。或是一段聲稱是哈瑪斯攻擊以色列直升機影片，但實際上是來自軍事電玩的遊戲畫面，這類手法使得虛假訊息看起來更具真實性（劉艾波，2023）。

事實上，以色列自 2011 年開始在全國推行「數位媒體與資訊素養課程」（Digit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DMIL），旨在提升學生應對數位時代假訊息與資訊過載的能力。以色列政府決定將此課程納入教育體系，重點包括資訊技術素養、媒體識讀、訊息來源評估、數位安全、和倫理教育等，特別強調學生要學會識別訊息來源的可信度和了解數位媒體如何被操控來激發情感。課程透過技術訓練、互動教學方法（例如小組討論和實際案例分析）來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研究顯示，當學校將 DMIL 納入課程後，以色列學生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如投票或志願服務）的比例有所上升，這表明該課程有助於提升公民參與意識然而，

專家指出，該課程仍需擴展，以涵蓋更廣泛的技能與主題，如學生的動機和自我調節能力。儘管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進一步擴展和改進，以確保學生能有效抵抗假新聞和外國認知戰爭帶來的挑戰。這一舉措不僅有助於個人發展，也有助於提升整個社會的媒體識讀水平，從而增強國家的安全（Sharon, 2021）。

## 伍、結論

在當前數位時代，不實訊息、假新聞及誤導性資訊的蔓延，特別是透過社群媒體和網路平台的快速傳播，這些訊息能夠迅速達到全球規模。為了有效抵禦這類資訊戰的威脅，各國已開始意識到提高全民媒體識讀的重要性，並將其視為國家安全與全民國防的因應之道。

尤其是面對俄羅斯和中國等國的訊息操縱策略，透過操控社群媒體上的訊息，散布虛假訊息、製造社會對立、影響選舉結果，甚至干預國際輿論。透過本文的文獻梳理，瞭解到各國針對假訊息的威脅，已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增強國民的媒體識讀，增強公民對假訊息的抵抗能力，避免受到外部勢力的操控與干擾。例如，歐盟強調假訊息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並制定了應對假訊息的行動計畫，旨在提升媒體透明度、推動公民的媒體識讀教育，以及打擊網絡上的假新聞傳播。芬蘭則透過將媒體識讀納入義務教育課程，提升公民的資訊評估能力，強化社會對假訊息的防禦能力。美國雖然沒有全國統一的媒體識讀政策，但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積極推動媒體識讀教育，幫助學生培養批判性思維，強化對訊息來源的審查能力。

在全民國防的角度來看，媒體識讀教育不僅能防止虛假訊息影響民眾的決策，還能提高整個國家的抵抗假訊息的韌性。在這一背景下，「免疫理論」的應用顯得尤為關鍵。通過讓個體事先接觸弱化版本的反對資訊，並進行相關反駁訓練，能夠增強個體抵抗未來訊息操縱的能力。透過教導個人如何辨別、分析和批判媒體訊息，幫助他們在面對虛假訊息時能夠迅速識別問題，從而形成對訊息操控的「認知免疫」。這種預防性防禦機制不僅能夠增強個體對假訊息的抵抗力，還能夠有效阻止外部勢力對社會輿論的干預和操控。

總結來說，強化媒體識讀教育是增強全民國防學校教育的重要施政。它不僅能有效應對當前社會中不實資訊的擴散，還能確保國人具備辨別資訊真偽的能力，從而提升整個國家的

安全與穩定。面對未來，從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制定具體的媒體識讀策略，並結合數位科技來全面推動，在資訊戰中保持競爭力並維護國家安全。

## 參考文獻

-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22）。《全民國防教育簡介》，政戰資訊服務網。  
<https://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519>
-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23）。《112年全民國防教育執行成效暨精進作法》，立法院議事暨公報資訊網。
-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24）。《全民國防教育簡介》，全民國防教育網。  
<https://aode.mnd.gov.tw/Unit/Index/120>
- 陳韻涵（2023）。《從小扎根 - 芬蘭對抗假新聞》，聯合學苑。  
<https://udncollege.udn.com/18883/>
- 劉艾波（2023）。《以哈戰爭假訊息席捲網路世界-馬斯克改造的推特成為重災區》，卓越新聞電子報。<https://feja.org.tw/73867>
- Abrams, A. (2019). Here's What We Know So Far About Russia's 2016 Meddling. TIME.  
<https://time.com/5565991/russia-influence-2016-election/>
- Addison, J. (2018). Teaching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s a Social Process in Writing Intensive Classrooms. In C. Z.Goering &P. L.Thomas (Eds.),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nd Fake News in Post-Truth America. Brill Sense.
- Akimenko, V., &Giles, K. (2020). Russia's Cyber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sia Policy, 15(2), 67 – 75.
- Benjamin, C. (2022). Fighting Disinformation with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land. Malmö University.
- Boler, M., &Davis, E. (2018).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the “post-truth” era: Feeling rules and networked subjectivity.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7, 75 – 85.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18.03.002>
- Boyd, S. A. (2017). 5 Ways Teachers Are Fighting Fake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pr.org/sections/ed/2017/02/16/514364210/5-ways-teachers-are-fighting-fake->

news

- Daniëlle Flonk, M. J., &Obendiek, A. (2024). Controlling internet content in the EU: towards digital sovereign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31(8), 2316 – 2342.  
<https://doi.org/10.1080/13501763.2024.2309179>
- EEAS. (2023). 2st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 (Issue January).
- EEAS. (2024). 2nd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 (Issue January).
- Emmott, R. (2017). Spain sees Russian interference in Catalonia separatist vot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spain-sees-russian-interference-in-catalonia-separatist-vote-idUSKBN1DD20Y/>
- Guardian. (2017). Emmanuel Macron’ s campaign hacked on eve of French elec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06/emmanuel-macron-targeted-by-hackers-on-eve-of-french-election>
- Hendrix-Soto, A., &Nash, B. (2023).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edia Literacy in Teacher Education: Accounting for the Challenges of Post-Truth Politic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19(1), 1 – 16.
- Lau, Y. (2023). Finland’ s ‘visionary’ fight against disinformation teaches citizens to question what they see online. *CANDA’ S NATIONAL OBSERVER*.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23/05/16/news/finland-visionary-fight-disinformation-teaches-citizens-question-online>
- Martínez, M. C., Sádaba, C., &Serrano-Puche, J. (2020). Fifty years of digital literacy studies: A meta-research for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nceptual convergence. *El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29, e290428. <https://doi.org/10.3145/epi.2020.jul.28>
- McComiskey, B. (2000). Teaching composi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eister, S. (2016). The “Lisa case” : Germany as a target of Russian disinformation. NATO



REVIEW.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16/07/25/the-lisa-case-germany-as-a-target-of-russian-disinformation/index.html>

Munteanu, D. (2024). Weathering the Disinformation Storm in 2024' S Electoral Context. In Proceedings - The 20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Strategies XXI" "Technologies – Military Applications, Simulation And Resources" (pp. 80 – 88). Carol 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Oberiri Destiny Apuke, B. O., & Tunca, E. A. (2023). Literacy Concepts as an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Improving Fake News Knowledge, Detection Skills, and Curtailing the Tendency to Share Fake News in Nigeria. *Child & Youth Services*, 44(1), 88 – 103. <https://doi.org/10.1080/0145935X.2021.2024758>

Olchowski, J. (2022). How to Weaponise Information-Russian Patterns. In *Disinformation, Narratives and Memory Politics in Russia and Belarus*. Routledge.

Sádaba, C., & Salaverría, R. (2023). Tackling disinformation with media literacy: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on Social*, 81, 17 – 33. <https://doi.org/10.4185/RLCS-2023-1552>

Sharon, A. (2021). Can Israel' s Digit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urriculum Help Students Engage with a "Post-Truth" World? Heinrich-Böll-Stiftung. <https://il.boell.org/en/2021/12/15/can-israels-digital-media-and-information-literacy-curriculum-help-students-engage-post>

The Hacker News. (2024). Russian COLDRIVER Hackers Expand Beyond Phishing with Custom Malware. Retrieved from <https://thehackernews.com/2024/01/russian-coldriver-hackers-expand-beyond.html>

Yousef, M., Rundle-Thiele, S., & Dietrich, T. (2023). Advertising appeals effectivenes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38(4). <https://doi.org/10.1093/heapro/daab204>

